
论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期间的大节

——还胡文虎的历史真面目

洪卜仁 孔永松

胡文虎是客属华侨有卓著成就的企业家，慈善事业家。近年来，对他的研究，重新引起史学界的关注，我们认为，准确评价胡文虎是必要的，同时条件也已成熟。目前史学界已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对胡文虎企业经营的成就，及其毕生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和兴办文化教育事业，作了充分肯定，对胡文虎自1931年至1941年间多次捐资捐药报效祖国的抗战大业，也给以高度评价。然而，对香港沦陷期间胡文虎的“动态”尤其是他的“东京之行”，或避而不谈，或毁誉参半，褒贬不一。《胡文虎研究》第二辑、第三辑，相继发表了《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时期之“谜”》和《胡文虎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署名文章，将各方的争议归纳为：媚敌说、权宜说、救民说和周旋说四种。分歧的焦点是香港沦陷期间胡文虎有否出任伪职及其“东京之行”的性质，而要害在于是否构成汉奸。上述两个疙瘩，如没解开，将影响对胡文虎的评价。本文拟依据历史资料，对上述两个“谜”，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胡文虎有否出任伪维持会会长或出任伪职的问题

关于胡文虎有否出任伪维持会会长或华人协会副会长等伪职的问题，40多年来，争论不休，虽“事出有因”，却“查无实据”。故而，康吉父在《胡文虎传》中，对此关键问题避而不谈，轻描淡写，一掠而过：

珍珠港事变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星加坡马来亚不久沦陷。胡文虎在闽、粤、港、星、马所有的报纸全部停刊或者被日本人接收。至于胡氏本人的下落如何，这到现在一直还是一个谜，没有人能道其详。^①

该传出版后二年半，康吉父在香港又发表了一篇题为《胡文虎传补遗》^② 的文章，对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期间的“动态”作了如下描述：

拙作《胡文虎传》出版以后，一位热心的读者曾予指教说，书中对于胡文虎在战时的生活，语焉不详，只曾‘轻轻一笔掠过’。这个指责不错……。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特地回了一趟新加坡，向一些深知内幕的老先生们多方请教，结果被我找到了一星半点儿蛛丝马迹。

原来，珍珠港事变以后，日军占领了香港的时候，老虎（胡文虎）那时候正住在香港。日本人把他跟颜惠庆^③等人一起软禁在半岛酒店，强迫他们出来组织“维持会”。胡文虎哪敢拒绝？可是，他推辞说：他一向是做生意的，不懂得政治，怎么能够办维持会呐？日本听他说的有理，不想多难为他。于是就由千叶出来打圆场，说：你既然一向是做生意的，那么，你现在就给我们做点儿生意吧。我们现在需要军粮，你就负责给皇军筹办军粮，这个我们相信你是做得到的。

‘当然，当然！’胡文虎毫不犹豫地马上答应说：‘这个我内行。而且在出大米的仰光、西贡、曼谷……我还都有分公司。可是运输问题得你们解决，因为我没有船，而且船上要插上日本旗才行。’

① 康吉父：《胡文虎传》，香港龙门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1964年7月，第70页。

② 见《南北极》月刊，第200页，1987年1月16日出版。

③ 颜惠庆，祖籍福建厦门，清末进入外交界。民国成立后，先后任北京政府外交次长、总长，内务总长以及国务总理等职务，曾摄行过总统职权。后任过驻外使节，抗战时期已退休，寓居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寓居香港九龙，香港沦陷后，被拘留于半岛酒店。日本驻华派遣军参谋长后宫淳、驻香港日军总司令酒井隆以及汪伪政权顾问影佐祯昭、河本大作等先后约他谈话，威胁利诱，要他出任伪职。他明确表示“无意再入仕途”，坚决拒绝，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日本人答应说这个没问题，而且指派了一个日本人负责跟他联络，那个人就是后来帮助胡蛟在香港向美国银行借款办英文报的千叶 X 郎。他说他当年曾经受过老虎的好处。

胡文虎在战时替日本皇军买米，使他可以一举两得：他因此摆脱了正面出头落水当汉奸，另方面也除了保护他自己原有财产之外，更大发特发了几年的横财，远超过销售永安堂的万金油跟头痛粉。这可以说是‘国难财’，也可以说不是，因为他替日本人买来的米，也曾经偷运到中国去给中国人，虽然并不是捐赠。这就是为什么停战之后，他的大名没列入汉奸名单的原因……。

本来，引文未必要全录，但为避“断章取义”之嫌，只好一字不漏照抄。从康吉父上文的描述，可以得出三个答案：

(1) 上述材料得来不易，是他特地从澳大利亚的悉尼前往新加坡，通过“向一些比较深知内幕的老先生多方请教”才获得的。作者在一句话里用了“一些”、“比较深知内幕”和“多方”来造句，反映了他是煞费苦心的：被他访问的不止一人，而且“是比较深知内幕的老先生”，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力求以材料的真实性取信于读者。

(2) 从他的材料里，证明了日本人原先要强迫跟他一起被软禁在半岛酒店的颜惠庆等人出来组织“维持会”，结果因为他推辞不懂得政治，没有接受办“维持会”的任务。

(3) 对胡文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没列入汉奸名单的原因，作了明确、具体的回答。

其实，早在 40 年代，国内的报纸就已披露香港沦陷期间胡文虎的“动态”。1943 年 2 月 17 日，在福建漳州出版的《福建新闻》曾刊载一则新闻，标题为“暴发户胡文虎，蛰港奉承倭寇，先后资敌数百万元”。摘录于下：

(香港讯)……及太平洋战争发生，胡以新加坡、香港、上海等地财产甚多，如移住内地，则数十年之经营，尽化乌有，……遂决心蛰居香港。奸心已动，群丑临门，敌军以胡逆殷勤备至，亦待以上宾之礼。闻胡逆先后捐赠皇军数百万元，最近

又捐献伪币一万四千元，给伪粤省政府设立孤儿院及养老院作设备费云。

这段新闻发布于胡文虎赴东京之前，虽然加上“逆”字说他“奸心已动”，但对他捐款给“皇军”和伪粤省政府作慈善事业仅是道听途说的“闻”，也没有报道他在哪个伪机关团体担任什么伪职。而在胡文虎“东京之行”后，国民政府第三战区的机关报《前线日报》刊载该报分区特约通讯《香港今日》^①，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政和汉奸的罪行，但文中罗列的汉奸名单，没有胡文虎的名字。

更令人疑惑的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2月18日，厦门的好几家报纸同时刊载一则新闻，报道厦门记者公会举行第二次会员大会的经过和决议案。这次大会共有四项决议，其中第三项决议是：“星光日报董事长胡文虎，曾充伪华侨代表赴东京媚敌，现仍逍遥法外，本会决电请国防部扣留惩办。”按照常规，这则新闻标题应以体现记者大会会议内容为主题，可是除《星光日报》外，好多报纸却都以突出胡文虎媚敌为主题，略举两例于下：

(1)《江声报》用双栏三行的标题：

新闻记者公会(3号宋体)

昨检举胡文虎(2号宋体)

伪华侨代表赴日媚敌(3号宋体)

(2)《立人日报》用三栏双行的显目大标题：

记者公会昨二次大会决议(3号宋体)

声讨胡文虎媚敌(特号宋体)

这之后，却未见国防部“扣留惩办”胡文虎的任何报道。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曾经制颁《惩治汉奸条例》十六条，也的确逮捕和判处了一批汉奸，但并没对胡文虎“依法惩办”。

至于胡文虎任伪香港维持会会长之说，经考证，香港沦陷期间从没有过伪维持会的机构。

1941年12月18日晚，日军在香港岛上的东部强行登陆，继

① 《前线日报》1944年10月23日，第五版。

续发动猛攻，英军退守岛上西部一隅，势穷力竭。25日，英国殖民政府的香港总督杨善琦竖起白旗，亲自渡海到九龙半岛酒店向日军总司令酒井隆中将签字投降。日军随即在半岛酒店设立军政府，统帅一切。1942年元旦，日本军政府设立地方行政部。10日，召集高层社会知名的华人133人开会，声称：“日军进攻香港，目标是英国及其盟邦。中日同文同种，故应合作。”^①12日，组织新生委员会，以备日军驱使。2月22日，东京宣布撤销军政府地方行政部，设立香港总督部，任命陆军中将矶谷廉介为香港总督，平野茂为副总督。与此同时，取消新生委员会，成立华人代表局和华人合作局，又称华人代表会、华民协议会，前者共有代表13人（一说3人），后者代表21人（一说23人）。^②日伪的这两个机构，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才消亡。据1946年出版的《香港年鉴》中的《香港沦陷大事记》的说法，这“两局”（或称“两会”）的代表（或称会员），“多数（是）英政府时代之绅士，其任务只为传达民意，并无权力”。^③叶德伟的《日治时期的香港》一文说，“两局的首长均由工商界名人出任，职责与‘新生委员会’大致相同”。^④

遗憾的是，《香港沦陷史》里的文章，都没有揭载香港沦陷期间汉奸的名单，也没有公布华人代表局（会）和华人合作局（协议会）成员的名单。指出胡文虎当过“香港华人协会”主席的，仅见于美国人包德华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为了搞清楚胡文虎有否任伪职问题，洪卜仁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和设在中环的香港图书馆查阅旧报纸，冀能得到一些可资凭证的材料，没料到香港沦陷期间的中文报纸，该两图书馆荡然

① 李宏：《香港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82页。

② 参阅：李宏：《香港大事记》；小庵《今日香港》、《前线日报》1944年，10月23日；1946年出版的《香港年鉴》中的《香港沦陷大事记》；叶德伟：《日治时期的香港》，载《香港沦陷史》，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9月再版。

③ 《香港沦陷史》，第105页，第118页

④ 《香港沦陷史》，第105页，第118页

无存，未能如愿以偿。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前线日报》那篇陷区特约通讯《香港今日》^①，倒是载有上述两局（或称“两会”）20个汉奸的名单，几乎都是香港各界的“名人”，胡文虎却“榜上无名”。一般来说，像胡文虎这样一个“赫赫有名”人物，又是赴东京回到香港一年多了，如有出任伪职，定当不至于被疏漏。

综上所述，对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期间出任伪职充当汉奸的问题，根据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材料，我们认为应该予以否定。

二、胡文虎“东京之行”的大节问题

胡文虎于1943年7月间，在日本“有力之士”（即特务）的胁迫下去了东京。7月17日14点至15点半，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在寓所会见胡文虎。胡文虎回到香港后感到他的“东京之行”，“外间有种种臆测”，便在伪《香岛日报》发表一篇言不由衷的署名文章，题为《何事赴东京》。^②随后，沦陷区的日伪报纸纷纷转载。日本在厦门办的《全闽新日报》还加上按语，加以吹捧一番；汕头伪《粤东日报》且发表了《拥护胡文虎先生之主张》……，大肆渲染胡文虎战前是“抗战派中极有力之侨商巨子”，如何“致力于救国捐输运动”，而“自大东亚战争爆发后，日军攻陷香港”，又是如何“受日军保护”，“因之幡然觉悟，倾向于和平救国旗帜”，“致力于和运之开拓”，企图拉胡文虎落水，挑拨胡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首先是香港的“英殖民地政府以胡文虎在日侵时期，有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合作之传说，而禁止其自由行动”。^③后经《南洋商报》主笔曾心影在该报发表文章对港英政府进行抨击；《星岛日报》全文转载，促使“英政府终于宣布解除对胡

① 《前线日报》1944年10月23日。

② 转引自《全闽新日报》（厦门），1943年11月28日。

③ 彭松涛：《以笔求人的曾心影》，《新加坡惠安公会六十周年纪念特刊》，1984年4月29日出版。

文虎行动”之禁令”。^① 尽管港英政府改正它的错误决定,但在海内外舆论中留下极不良的影响,导致近半个世纪在人们的脑海里,甚至一些学者、专家仍对胡文虎“东京之行”的性质争论不休。因而笔者认为,40多年来影响对胡文虎正确评价的责任,不能怪大陆的史学界;更不应该怪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我们的责任,是踏实地发掘尽可能多的史料,加以鉴别,去伪存真,以期还胡文虎历史的本来面目。

今年7月,洪卜仁应邀赴日访问,在日本大学查阅到《东条内阁总理大臣机密记录》。其中昭和十八年(1943年)7月17日14点至15点30分,有东条与胡文虎谈话的记录^②约4000字,开头互相问候,接着胡说:“当前,中国的民生问题相当严重。”东条即说:“久闻您的大名,……我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而请您上东京来的。”显然,胡文虎是东条授意“有力之士”“请”他去东京的。东条说:“日中之间的战争,其本质是兄弟之间的矛盾吵架,这与日本和英美之间的战争有着根本的区别。日本与英美之间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毁灭性战争。尽管我们和重庆政府处于战争状况,仍是一种兄弟之间吵架的性质。如果重庆政府承认由于当了英美的傀儡而造成中国人民涂炭的苦难,并对此错误悔改的话,我将在国会及其他场合宣布日中战争明天就可以结束。”听了这段话,胡文虎立即抨击汪伪粤伪政权。他说:“……现在的汪精卫政权是依靠日本的力量支撑的,但就当前汪的政权而言,仍有不足的地方,如上海的商人,南京的政客,只知道捞钱。广东地方政府在政治上用人不当,任人唯亲……那么人民悲惨苦难生活,又如何能够得到拯救呢?”胡文虎敢于当着东条英机的面抨击汪伪、粤伪政权,其爱国精神与胆量可以想见。东条听了胡文虎抨击伪政权的话后,立即为之辩护,东条说:

① 彭松涛:《以笔求人的曾心影》,《新加坡惠安公会六十周年纪念特刊》,1984年4月29日出版。

② 《大臣与胡文虎的会谈要旨》,见伊藤隆、广桥真光、片岛纪男编:《东条内阁总理大臣机密纪录》,东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200—204页(以下引文同)。

“南京政府成立的时间很短，好比 3 岁的孩子，不能象要求大人一样来要求它。所以，要求南京政府在政治上完全成熟是没有道理的，只能尽力扶植培育它茁壮成长。”

接着东条转到“请”胡文虎上东京的真正意图。他说：“普救民生的有关问题，是我今天想和您谈的主要内容。中国人民如今生活十分艰难、困苦，我听说常有人饿死，然而缅甸却有富余的大米，作为日本帝国，在拯救缅甸人民的同时，有责任确保从那儿购入富余大米。如果我们单方面考虑中国人民没有米吃，却不管缅甸还有富余的大米卖不出去，那么，保障东南亚 10 亿人民生活就是一句空话。在此，我希望您能认识到自己的使命，为协助帝国工作而努力。”“日本目前正处于战争之中，急需钨、棉花、桐油等战争物资，您如果能尽力从内地运出这些物资，日本将无偿地把缅甸的大米给您交换作为代价，就是物物交换。这样中国的百姓就会得救了。关于运输的船舶问题等事，想办法大体可以解决。”东条英机“请”胡文虎到东京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胡把缅甸富余的大米运出来，然后把战略物资钨、棉花、桐油运去日本。

东条又说：“目前，帝国的政策是保护南洋华侨，并努力使其生存、发展，不对帝国起破坏作用。现在华侨状况如夹在齿缝中的东西似的，请您就华侨状况提点改善意见，不用顾虑。”胡文虎即答：“华侨们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是无法比拟的。当初中国在英美的压迫下，华侨最大的愿望就是早日摆脱英美的压迫。满洲事变之后，陈果夫利用华侨的爱国心，私吞华侨募捐的 20 万元，为此，我强烈抨击陈的行径，结果退还了剩下的 3 万元。陈之所以能募捐到那么多钱，是因为民心已转向抗日，接着又发生了太平洋战争。现在日本应考虑释放华侨中的优秀代表人物。”谈话中东条又把话题引到运米的“正题”上来，东条说：“关于运取缅甸富余大米救济百姓的问题，您有什么高见？”胡答：“船只是次要问题，我主要考虑根本问题，日中之间的战争，现无论怎样努力，中国暂不能胜利。尽管如此，我仍希望贵国不要继续进攻重庆，如果贵国加强进攻中国，那

么即使运来缅甸大米，我看对解决民生问题仍无济于事。如果贵国能缓和战争，那么，我将尽力做好战争物资与缅甸大米的交换工作。”东条接着说：“是否再进攻，这是上层军事统帅的问题，今后是否继续进攻重庆，并非我说了算。重庆政府现在把中国领土租给美国，却轰炸日本占领地……，跟随英美主子之后为非作歹，这样，当然要消灭它。”“再说，关于钨等物资的运出问题，我们现在还不想和重庆谈判，您想贡献您的慈善心愿，无妨找您的朋友（指蒋介石——笔者）谈谈。”对于东条要胡文虎在中国内地运出战略物资到日本，胡文虎则明确表示：“要获取中国内地物资，这关系到贵国与蒋的势力问题，如果对两方面情况不了解而着手进行，途中就会遇到困难，加上和英美的矛盾，要能获取内地的物资，困难重重。”“再说，现在要重庆方面立即改变立场，也是不可能的。”

东条又把话题拉回到运米的“正题”。他说：“关于日中之间的关系的分歧，我们暂时搁置不谈，尽量谈谈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吧。您考虑如何运出缅甸大米以救济百姓呢？”胡答：“尽管阁下想把对重庆的战争与中国人民的民生问题分开来谈，然而在目前形势下，这实际是一个问题。我是个华侨，我实在不忍看着人民在苦难中挣扎。”在这里，胡文虎清楚地表明，中国人民饥饿、困苦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战争引起的，战争与民生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对此，东条英机也赤裸裸地表白：“从理论上来说，帝国现在正全力支持着汪的政权，因此和汪的关系无须与您讨论。再说，您现在就想探求问题的结论，也是不可能的。您还是尽量直接谈谈，您要如何救济中国人的打算。”胡说：“最要紧的是尽量不要再给中日两国添麻烦，特别是给蒋介石政府添麻烦。”接着又说：“我当然是要站在自己有限的立场上来寻找解决民生问题的途径。我实在目不忍睹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东条接话说：“我的本意也在于拯救中华民国百姓的苦难处境。”（胡还想和大臣商谈有关中国南方的一些问题，被大臣身边的几位“长官”阻止——记录原有，笔者注）最后东条强调说：“总而言之，重要的是解决缅甸大米的运出问题，望您妥

善解决。”胡应付自如地说：“我目前尚被软禁，如何方便去运米呢？”东条说：“关于您被软禁一事，我不知道，今后如有不方便之处，您还可以来找我解决。您被软禁，该是香港总督府干的事情，为了这次运米的顺利进行，我会尽量向有关方面交代提供方便的。”

以上就是胡文虎“东京之行”与东条英机谈话记录的主要内容。从这些内容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胡文虎处于被软禁的境地，是东条英机通过特务强迫他去东京的，而不是他在《何事赴东京》中说的“慨然乘船前往”。东条“请”胡去东京的主要目的是要胡文虎将缅甸过剩的大米运到中国以换取日本紧缺的钨、棉花、桐油等战略物资。谈话中胡表示，将缅甸的大米运出来可以办到，但要把大陆战略物资运去日本则“困难重重”难于完成。胡文虎当着东条的面，抨击汪伪、粤伪政权的腐败，表示对抗战的蒋介石重庆国民政府的支持与同情，同时表达广大华侨是热爱祖国的，要求日本政府释放东南亚华侨领袖。虽然在谈话中有互致问候和几句恭维的话，但没有丝毫“失节”，相反地表现出来的是爱国侨领的民族气节。因此，把胡文虎的“东京之行”说成“媚敌”，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疑他为“汉奸”或“准汉奸”更是历史的误会。

胡文虎“东京之行”的性质已真相大白：在香港沦陷期间，他没有出任过伪职，我们应拭去蒙在他脸上的政治灰尘，还胡文虎爱国侨领的历史真面目。

（作者单位：洪卜仁，中共厦门市委党史办公室；
孔永松，厦门大学历史所）